



# 为信念献身的革命伴侣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为了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前赴后继，壮烈牺牲。其中，贵州的王启霖和刘家祥正是这样一对英烈伴侣。

## 王启霖：以笔墨为戈矛

王启霖（1915年—1949年），化名王慰民，笔名冰波、启霖等。1915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在贵阳出生。王启霖在贵阳接受启蒙教育，从正谊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贵阳一中读书。高中肄业，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工系。在校学习期间，王启霖受进步教师和同学影响，对进步书刊及鲁迅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1936年，王启霖求学日本，先在东京学习日文，准备报考大学深造文学。次年“七七事变”爆发，王启霖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而放弃求学，随后回到祖国。

1938年2月，王启霖受邀参加了《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工作，与蹇先艾、谢六逸、齐同（高涵）、李青崖等优秀现代作家、翻译家一起，以文艺副刊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由于王启霖政治表现突出，思想觉悟高，贵州地下党发展其为中共党员。

为团结更多知识分子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其他工作，王启霖根据党组织安排，发起并主持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他还邀请革命家徐特立、《资本论》中译者王亚南到

### 新婚之时奔赴抗日前哨

社会科学座谈会，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演讲，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1939年后，国民政府发动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社会科学座谈会被迫转为地下秘密活动。王启霖克服困难，坚持把活动一直办到年底。此时，王启霖还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的实际组织领导和“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夏之交，王启霖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部和统战支部书记。同时，敌人也加强了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贵州省工委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隐蔽骨干”的指示，要处于暴露状况的王启霖立

即转移。王启霖遵照党组织安排，到达广西桂林，与先行转移的刘家祥（地下党贵阳女子中学党支部书记）在桂林结婚。王启霖夫妇不顾新婚燕尔，随即奔赴处于抗日前哨的皖南新四军中。王启霖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文化小组，同何士德、任光等几位同志抓文化宣传工作。刘家祥在新三团政治处宣传股。“皖南事变”中，王启霖夫妇二人被敌人逮捕，在敌人押解途中，夫妻二人在战友的掩护下双双逃脱。后辗转于桂林、广州、香港、昆明、衡阳等地，在各地中学和大学教书，向学生灌输爱国、民主、进步思想。



王启霖牺牲前照片。

### 留下著作启示后人

1949年春，王启霖与刘家祥回贵阳过寒假，准备启程回湖南衡阳师范学院，途中被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留住，遂返回贵阳，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编辑出版地下刊物《真实》的任务。他不仅当编辑，而且常亲自动笔为《真实》写文章。同年5月的某天，中统特务在贵阳街头发现了王启霖的行踪，继而向特务机关作了汇报。敌人立即派出暗探，终日守候在白沙巷王启霖家附近。6月23日上午，特务、警察闯入王家，逮捕了王启霖，接着又逮捕了从外边办事归来的刘家祥。王启霖夫妇在狱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为保护组织和同

志，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9月某日深夜，敌人秘密杀害了王启霖同志。同年11月11日，敌人在仓皇逃跑之际，又枪杀了刘家祥同志。

王启霖从“皖南事变”前后开始进行文艺创作。目前已知的他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有反映“皖南事变”真实情况的《煎》；反映贵州彝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四围山色中》。令人惋惜的是，这两部长篇巨著定稿之后，均在战乱中遗失。他的又一部中篇小说《狂雨》的手稿，交人保管也遭损失。但王启霖并未因此而沮丧，他挤出工作、战斗的空余时间，将小说重写，交给同乡

挚友林辰同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启霖在文学创作方面，写得最多、质量最高的是短篇小说。其中代表性的有描写抗日战争的《封锁线》，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告密者》《朋友，向我们伸出你强大的手吧》，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呐喊的《迫害》等。此外，王启霖还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政论文，代表性的文章有《由自杀到自杀》《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等。

## 刘家祥，风风火火干革命的贴心大姐

### 故事讲述人：

刘家瑜，刘家祥妹妹，曾任贵州广播电视台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清镇县团委副书记、团省委委员。

刘家祥（1922年—1949年），女，贵州贵阳人，系王启霖妻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热爱文艺活动的刘家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筑光音乐会”和“沙陀业余话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 投入“学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刘家有11个孩子，刘家祥排行老二，刘家瑜排行老六，两姊妹相差10岁。1938年4月，16岁的刘家祥经高旭介绍，在华家阁楼里，发展成为共产党员。那时刘家瑜还是个6岁儿童，什么都不懂。再加上，刘家祥一直对家人保密，刘家瑜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姐姐的身份和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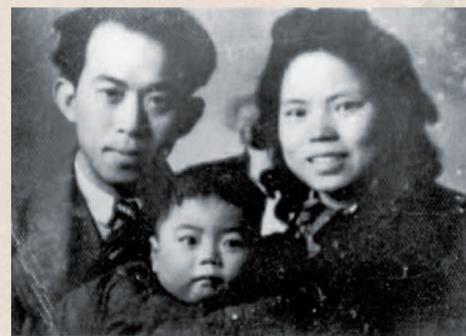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贵阳成立了“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刘家祥积极投入“学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

活动。国民党贵州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于1938年2月19日逮捕“学联”骨干7人。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贵阳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刘家祥与进步师生一道参加请愿和示威游行。“学联”遭破坏后，热爱文艺活动的她旋即转入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筑光音乐会”和“沙陀业余话剧社”，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外面，刘家祥是激情轩昂的爱国学子；在家里，刘家祥就变成了贴心的大姐姐。因为兄弟姐妹太多，刘家瑜出生后被寄养在保姆家，保姆对

她并不好，一岁时，还偷偷用她抵债。知情后的家人这才把刘家瑜接了回来。11岁的刘家祥就把妹妹带在身边，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而在姐姐刘家祥的影响下，弟弟、妹妹们也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太行山上》《渔光曲》等革命歌曲。

在刘家瑜的印象中，姐姐除了爱唱歌之外，还喜欢打篮球，是贵阳女中篮球队队长，球艺精湛。她通过体育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把进步同学组织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篮球队的多数同学成为抗日宣传队的骨干。



刘家祥夫妇和大儿子。刘家瑜 供图

### 狱中鼓舞狱友“天快亮了”

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对贵阳狂轰滥炸。贵阳女中搬到花溪。这时刘家祥参加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她利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身份团结了不少同学。刘家瑜记得，姐姐出门去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以“一起出去玩”的理由带上她和妹妹。有时是去花溪，有时去黔灵公园，还有红边门附近，当时，刘家瑜还有个任务就是负责去约姐姐的朋友。等姐姐约的人到齐后，大人们去开会，刘家瑜和妹妹就被留在开会地点的附近玩耍，还提醒她们要警惕陌生人，其实就是放哨。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干事会组织各校会员到花溪排练《黄河大合唱》，准备正式公演，贵阳女中的很多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反动当局知道这一情况后，策划进行

破坏。当城内的“筑光”会员刚到花溪时，就遭到特务包围，特务当场逮捕了“筑光”的负责人，宣布不准排练，第二天国民党省党部勒令解散“筑光音乐会”。此时，刘家祥已被特务监视。

1940年，临近高中毕业的刘家祥，被学校勒令退学。就这样，刘家祥不得不离开战斗学习了几年的贵阳女中。后来，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党内外有可能被捕杀的一批同志疏散转移外地，刘家祥撤离贵阳到桂林，在桂林，刘家祥与老乡王启霖结为夫妻。同年11月，他们一起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后来，几经波折，刘家祥夫妇漂泊在外，去了湖南、香港、重庆、昆明等地。1949年，一家人回贵阳省亲，在返

回湖南的途中，刘家祥夫妇与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相遇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于是，两人重新回到家乡。

1949年6月23日，王启霖在位于白沙巷的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家祥闻讯返回家时，也遭暗藏的敌人逮捕，就连一岁的女儿思梅也没放过，关在岳英路监狱。在狱中，刘家祥多次遭受酷刑。她还向女狱友们宣传：天快亮了！鼓舞大家和敌人作斗争。一天放风时，有人从垃圾堆上拾到一张破报纸，从字里行间知道解放军已进驻贵州。

可是，刘家祥没有等到那一天，11月1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山城贵阳之际，国民党对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下了毒手。刘家祥殉难于贵阳南郊马家坡。



1949年刘家祥的三个子女，中间的小女孩是与二姐同时入狱的，入狱时才一岁多，临1949年前被亲人带回家。刘家瑜 供图



刘家祥同志

刘家祥牺牲前照片。刘家瑜 供图